

Ethical Issues in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I-Chung Che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proceed with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is an ethically serious and difficult on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ee major ethical issues involved in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concerning, respectively, the moral status of embryos,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embryos, and the cloning of embryos for research purpos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uman embryo as a person carrie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some of which are not on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penalty provided in abortion legislation, but are deeply at odds with most people's moral intuitions. Those who speak of slippery slopes,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and desensitizing of human life, are right to worry but wrong to believe that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necessarily opens us to such dangers. We should allow research to proceed subject to ethically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This approach offers the better hope of harnessing biomedical progress with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embryonic stem cells, embryos; instrumentalization, research cloning

一九四六年國民大會 由延會到開會期間的國共爭執

栗國成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收稿日期：91年10月16日 接受日期：92年1月21日
謹對評審委員之指正，表示謝意。

中文摘要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定於同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會後因國共雙方不論對政協決議，或「三人會議」議訂的軍隊整編方案，均爭議不斷，加以東北問題之爭執，使得國民政府最後不得不宣告延期召集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延期召集以後，國民政府為收復主權而在東北用兵，多少含有迫使中共在政治上讓步用意。結果引起來華調處國共關係的美國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之不滿，國民政府被迫於同年六月六日下令停戰，與中共再作政治談判。但中共在談判中並不肯作重大讓步，反而在華北各地展開軍事行動，國共之軍事衝突轉劇，而國民政府在談判立場上亦甚強硬，致談判未曾取得協議。

國民政府七月初公告，決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軍事壓迫中共在政治上屈服，仍為主要策略；因有十月份對張家口之占領。此舉更導致國共關係惡化，及馬歇爾之不滿。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政府終於在中共拒絕參加的情況下，召開了國民大會，隨後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完成了其「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中共則宣佈與國民黨關係之決裂，而馬歇爾來華任務，遂終以失敗收場。

關鍵詞：政治協商會議，國民大會，〈政協憲草修改原則〉，〈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中華民國憲法》，蔣中正，毛澤東，周恩來，馬歇爾。

壹、前言

按照孫中山的主張，一九二八（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全中國以後，即為軍政時期結束、訓政開始時期；訓政時期在中央及省的部分，實際上是「以黨治國」時期，暫無民主政治可言，但有關實踐孫中山民權主義最主要的工作，應為實行「縣」級的地方自治，以及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之草擬與制頒，俾國家得以進入憲政時期——即一般憲政民主國家之常軌。¹一九二九年六月，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規定「訓政時期為六年，至民國廿四年完成」，俾屆時能進入憲政民主時期。惟「縣」一級的地方自治工作，自北伐以後因內憂外患交逼，政局動盪不安，成效不彰。²一九三六年五月，國民政府雖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通稱之「五五憲草」）之草擬與公佈，並於該年七月以後，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俾得以召開國民大會，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之制頒；然至翌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時為止，各地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並未辦理完竣，而國家已進入戰爭狀態，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的工作，逐一再的遭到拖延，未能實現。³此一背景，提供了中共在抗戰末期，對國民政府展開「民主化」政治攻勢的重要藉口。

¹ 見〈孫文學說〉，第六章「能知必能行」及〈建國大綱〉，《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388、623-4。

² 《革命文獻》，第七十九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頁128；第七十六輯，頁405-10、475。

³ 民國廿五、六年間，各省市已選出區域國大代表557人，職業團體國大代表259人，且依當時〈國民大會組織法〉之規定，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執、監委員，均得為國民大會之當然代表，國民政府且得指定國大代表240人（當時並未指定）。參見《國民大會實錄》，1946，頁9-12、62-3、73-86、317-9。

因國民政府五次「圍剿」而侷促於延安一隅的中共，抗日戰爭爆發後，因發表「共赴國難宣言」⁴，而為國民政府所接納，共軍且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接受國民政府餉械之供應，俾共同抗日。中共從此乃積極從事於實力之擴充⁵，戰時國共間軍事摩擦與衝突乃日益增加；加以中共欲求國民政府承認其抗戰以來擴張之所得及增加餉械之供應，因此遂有抗戰時期國共間的五次商談之舉。惟一九三九至四〇年及一九四三年戰時國共第一、二次商談期間，中共所要求者，多為共軍番號之擴編及陝甘寧邊區政府之承認等項，並未及於國民政府中央政權之開放問題（按：抗戰前中共曾提出「黨派合法化」要求）。但自一九四四年春戰時國共第三度談判起，要求國民政府「民主化」，如：籌組聯合政府、召開黨派會議以解決國共間之爭執，遂成為中共在國共雙方談判中最主要的政治訴求。這種政治訴求，歷經同年底及翌年上半年有美國特使（後受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介入的戰時國共第四、五度商談⁶；乃至戰後的重慶會談⁷，基本上並無改變。

⁴ 中共在此項宣言中表示願：一、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暴動政策，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四、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參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85，頁286-7。

⁵ 參見〈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373-406、502-5、702-10。

⁶ 有關戰時國共間的五次商談，請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四）》，頁217-316。

梁敬鎔，〈赫爾利調停國共之經過〉，《中美關係論文集》，台北：聯經，1982，頁57-106。

關中，〈戰時國共商談〉，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台北：聯經，1982，頁243-307。

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1-98。

《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重慶出版社，1992，上、下卷。

⁷ 「重慶會談」始末，參閱拙著，〈戰後初期的國共關係（1945年8-12月）〉，《國家發展研究》，第一卷第一期，2001，頁197-212。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邀毛澤東所舉行的「重慶會談」（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至十月初），中共在會談中雖未堅持要求其前所主張的「聯合政府」與「黨派會議」，但對國民政府應承認其所擁有的「解放區」及軍隊，及委任中共人員為華北熱、察、冀、魯、晉五省省主席及全國其他各重要省市副首長等要求，則絕不放鬆，雙方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簽訂「會談紀要」。⁸從該「會談紀要」觀察，儘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及軍事三人小組會議（軍政、軍令部及共軍各派一人），以商討「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之步驟（如：討論國民大會之召開問題、修改五五憲草等項），中共之解放區及共軍駐地」等問題，乃為雙方一致同意之見解。中共雖不允將其軍隊與解放區完全取消，但同意縮編之共軍數目由四十八個師降為二十個師，江南各地共軍亦同意全面北撤。而關於人民自由問題、黨派合法化問題、地方自治問題等項，國民政府方面也作了相當程度的讓步。

重慶會談期間，國、共雙方已因對山西東南部的爭奪，爆發了「上黨區作戰」，結果國軍敗績；重慶會談結束後，接著國共又爆發了河北省南部、綏遠省東部，乃至東北地區等地的爭奪戰。使中共在華北、東北佔有優勢，這時已成了毛澤東首要完成的政治目標⁹，中共為求有效阻滯國軍北上接收，乃不斷指示各地共軍，應積極徹底的破壞或控制華北、華中地區的各重要鐵路要道。¹⁰因此重慶會談以後，不僅應迅即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與軍事三人小組會議，無法儘速開會；而「避免

⁸ 參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85，頁97-102。

⁹ 參見《勘亂簡史》，第一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2，頁9-19。拙著，〈戰後初期的國共關係（1945年8-12月）〉，《國家發展研究》，第一卷第一期，頁212-224。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1997，頁520-539。

¹⁰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頁153-4、171-3。

《戰後中國（三）》，頁48-50。

軍事衝突、恢復交通，乃至國軍進軍東北」等問題，則反而成了國共雙方新增且難解的議題，因此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國共雙方代表雖續有多次之折衝，惟關於以上各項議題，卻無一能獲致具體的解決方案。此一僵局，直到十一月廿七日，赫爾利在美國宣布辭卸駐華大使職務，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總統隨即宣布，以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為駐華特使，並於十二月十五日發表「對華政策聲明」¹¹〈該聲明要點為：中國境內之軍事衝突應協商停止，國民政府應結束「訓政」、組成「聯合政府」，此為美國軍經援助中國之先決條件。〉以後，國共雙方始再度恢復已停頓之談判。

貳、1946年5月國民大會延期召集之由來

在馬歇爾調處下（馬氏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日抵達重慶），國共雙方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頒佈了停戰令，政治協商會議亦於同日正式開議。¹²自一月十日至卅一日政治協商會議共開會十次，並分別就「國民大會」、「五五憲草」、「擴大政府組織」、「和平建國綱

¹¹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勘亂時期」，第三冊，《國共協商與共軍叛亂》，頁1-12、340；《特交檔案》，《政治防共（國共協商）》，第十五冊。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624-7。

《戰後中國（三）》，頁48-50。

¹²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頁909-910卷六（上），頁8。《戰後中國（二）》，頁123-4，134-5；《戰後中國（三）》，頁69-70。《王世杰日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五冊，頁263-5。《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632-3，634-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 IX,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10, 25-6, 43-129. (本參考資料以下均簡稱 FRUS)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Inc., 1976), vol. I, pp.13-7.

領」、「軍事問題」等五大議題達成了協議；而於二月一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佈。¹³其中除「和平建國綱領」外，其他四項政協決議，國共間日後均產生了不少爭議，成為影響五月初國民大會被迫延期召開的重要因素，說明如下：

一、關於「國民大會問題」政協會後之爭議

政協會議期間，有關國民大會問題之決議重點有：

1.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
2. 憲法之通過須經出席國民大會代表四分之三之同意為之。
3. 國民大會代表總名額，定為2050名。
4. 抗戰前原已選出之國大代表，其任期繼續有效。
5. 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名額七百名。（其分配國、共、青年黨、民主同盟、社會賢達五方面，分別為220，190，100，120，70名。）

以上各點其中以4、5兩點，會議期間爭執最烈。¹⁴惟三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公布「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補充條例〈及附表〉」，卻將國民大會代表總名額，較政協協議的2050名多增加了46名，使中共與民盟欲在未來的制憲國民大會中，對憲法草案行使否決權的可能性為之降低，大為中共所不滿。四月二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作成對「政治協商會議報告」之決議，其中第四點復要求國民政府能再增加國民大會代表之名額，以廣為延攬絕大多數無黨派人士、

¹³ 政治協商會議經過及各決議案詳細內容，請參見

李炳南，《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談判》，台北：永業，1993，頁59-276。《戰後中國（二）》，頁111-249。

¹⁴ 《戰後中國（二）》，頁239。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台北：商務，1967，頁359-360、374-6。馬歇爾謂，中共之所以願意對原已選出國大代表之效期讓步，是因為得到國民黨代表願對修改憲法草案讓步之回報。參見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29-31.

民意機關代表、文化實業各界、邊疆、海外、婦女同胞等。中共之反應，遂更趨於強烈。¹⁵

二、關於「憲法草案問題」政協會後之爭議

政協決議之〈憲草修改原則〉，對原〈五五憲草〉增損之處甚多¹⁶，如：

1. 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
2.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選民直接選舉之，其職權相當於各民主國家之議會。
3.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4. 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長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長不得再提請解散立法院。
5. 司法院大法官、考試院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6. 監察院由各省級議會及各民族自治區議會選舉之，行使同意、彈劾及監察權。
7. 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牴觸。

頗為國民政府當局所不滿。二月十日，蔣中正約集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國民黨方面之委員談話，對政協〈憲草修改原則〉對孫中山主

張之「五權憲法」多所更易，頗表不滿。經國民黨之努力，在三月十五日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與綜合小組之聯席會議中，因中共代表之讓步，而獲致三項修改協議：1. 國民大會為有形之國民大會。2. 取消立法院與行政院間之不信任權與解散權。3. 省憲改為省自治法。惟正在開會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仍不滿意，認為尚有「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最基本之依據。」及「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兩項修改意見，應予實現。¹⁷ 惟因十八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閉會以後，延安中共方面對〈政協憲草修改原則〉已遭國民黨修改一事極端不滿，除表示政協各項決議，決不容修改外；並決定中共將因此「不能參加國大、參加政府。」¹⁸ 因此在往後的憲草審議委員會中，能再獲得協議修改的機會已經很少，而成為國共間另一爭執焦點。其後國民政府即依據三月十五日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與綜合小組聯席會議通過之修憲原則，草擬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而於該年底獲得了制憲國民大會之通過。

¹⁷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頁381-3。

《戰後中國（二）》，頁497、518-536。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五冊，《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上）》，頁142-159。

〈政協憲草修改原則〉乃政協憲草分組委員會各黨派代表共同協商的結果（含國民黨），國民黨在開會期間並無異議，何以會後又要求修改？據政協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引述政協秘書長雷震的話說：因政協憲草小組國民黨代表孫科並未當面向蔣中正作匯報，僅將憲草小組會議紀錄送蔣過目，而蔣一直未看，直到政協閉幕前夕，蔣始看到會議紀錄，但為時已晚。惟馬歇爾認為，國民黨對憲草修改原則讓步，係為交換中共對已選出舊國大代表效期之讓步。王世杰則認為國民黨憲草分組委員會代表孫科、邵力子應負輕忽將事之責。參見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上卷，頁733。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263。

¹⁸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96-9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651-5。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上卷，重慶初版社，1989，頁645-663。

¹⁵ 參見《國民政府公報》，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渝字第1005號。

《戰後中國（二）》，頁267。

《周恩來年譜》，頁651-5。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頁163-71。

¹⁶ 有關〈政協憲草修改原則〉與〈五五憲草〉異同之比較，參見《岫廬八十自述》，頁379-380。

喬寶泰，《中華民國憲法與五五憲草之比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頁119-123。

三、關於「擴大政府組織問題」政協會後之爭議

政協有關「擴大政府組織」之決議案，其要點有：

1. 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定為四十人（內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2. 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其總額之半數由國民黨人員充任，其餘半數，由其他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
3. 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政府最高國務機關，討論及議決：(1) 立法原則，(2) 施政方針，(3) 軍政大綱，(4) 財政計畫及預算，(5) 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之任免，暨立法、監察委員之任用事項，(6) 主席交議或委員三人以上連署提出之事項。
4. 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一般議案，以出席委員之過半數通過之。國民政府委員會所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贊成，始得議決。某一議案，如其內容是否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發生疑義時，由出席委員之過半數解釋之。

其中涉及國民政府委員會，協議未臻完備、進而影響日後政局發展之關鍵者，厥為政協會議「關於國民政府委員會四十席委員中，非國民黨籍二十席國民政府委員，各黨派及無黨派之社會賢達人士，名額究應如何分配問題」；當時並未能即時取得協議，只訂一「其分配另行商定」的條款。¹⁹ 結果隨著會後國共紛爭的日益增加（如國民大會代表名額增加問題，〈政協憲草修改原則〉之再修改問題，東北問題之爭執等），以及中共與民盟堅決要求在非國民黨籍的國民政府委員席次中，必須合占十四席，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議中取得三分之一以上的否決權，但未能獲得國民黨之認同，遂使得基於此項條款始能產生的「聯合

¹⁹ 《戰後中國（二）》，頁230。

政府」，從此陷入難產的境界；連帶也影響到了國民大會的召集問題。因為依照政協有關「擴大政府組織」之決議案，國民黨應在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先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府」。²⁰ 於是「擴大政府組織案」，不僅又成為國共間一項一直無法化解的爭執，且牽涉到國民政府未改組以前，其召開國民大會的動作，是否「合法」的問題。

四、關於「軍事問題」之爭議

政協有關「軍事問題」之協議，計分建軍與整軍原則、實行以政治軍辦法、及實行整編辦法四項。二月九日，「三人會議」²¹ 就「恢復交通」獲得協議，而於十一日公佈。十四日，「三人會議」依照政協關於軍事問題「實行整編辦法」之協議，就馬歇爾所擬方案，研討軍隊整編及縮編共軍問題，經六次之商討，而於廿五日簽訂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該方案之要點有：一、陸軍之編組，每軍轄三師，每師人數不得超過一萬四千人。十二個月終了，政府軍應編為九十個師，共軍編為十八個師。十二個月終了後之六個月，政府軍更應縮編為五十個師，中共軍更應縮編為十個師，合計六十個師。二、協定公布後三星期內，政府應擬具所保留九十個師之表冊，及最初兩個月部隊復原之次序。在同期內共黨應擬具其部隊之詳細表冊，說明其性質、兵力、武器、旅以上司令官姓名，及各單位之駐地；此項報告，並包括所保留十八師之表冊，及最初兩

²⁰ 同上，頁229。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頁360-4。

²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停戰令〉頒布前，國共雙方代表曾擬定「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意：停止各地一切軍事衝突；由國共各派代表一人會同馬歇爾（即「三人小組」）從速商定關於停戰、恢復交通、受降等辦法，提請政府實施；七日，張群、周恩來、馬歇爾之三人小組首次舉行會議，討論「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的具體內容。至一月十日止，歷經五次之商談，終於就馬歇爾提出的「停戰」及「軍事調處執行部之組成」兩草案達成協議。是為「三人會議」之由來。

個月復原之次序。上項文件表冊，均應送交軍事小組。三、各軍之配置，十二個月終了時，為1、東北方面六個軍（內國軍五個軍，共軍一個軍）。2、華北方面十一個軍（內國軍七個軍，共軍四個軍）。3、華中方面十個軍（內國軍九個軍，共軍一個軍）。4、西北方面五個軍、華南方面四個軍，全屬政府軍。四、十八個月終了時，東北、華北、華中、西北、華南方面分別為五、六、四、三、二個軍，其中東北方面四個軍（每軍三師），全屬政府軍，另一個軍，則包含政府軍兩個師、共軍一個師；另華北、華中各地駐軍，部分「軍」亦應有國、共師級部隊之混和編組。²²

抗戰勝利後，為減輕國庫負擔、汰弱留強，國軍開始進行縮編。「三人小組」簽訂「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基本方案」後，國民政府依該方案之規定，持續下令分期整軍，以便於該年底前將國軍兵力縮減至九十個師，以符合該方案之規定：第一期於四月底以前，縮編隴海路地區之27個軍，為27個師；第二期於六月底以前縮編長江以南地區31個軍，為31個師。共計編餘軍官十六餘萬人，士兵四十五萬餘人（約為原額之三分之一）。至第三期應行整編部隊，原定八月底縮編完成；惟因中共自本方案簽訂後，其部隊並未依時限提出整軍清單實施整編復員²³，抑且徵兵擴軍；而本年一月十日所簽訂之「停戰協定」及二月九日所達成之「恢復交通協議」，亦因國、共雙方在東北、華北方面之軍事衝突轉劇，而遭破壞，於是國軍原定之第三期整編計畫，乃告緩辦。該年七月下旬，國民政府且因實際之軍事需要，而在隴海線及其以北地區實施徵兵。²⁴於是政協有關軍事問題之協議事項，國、共

雙方經馬歇爾介入而簽訂的「部隊整編與統編方案」，至此遂成具文。

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大會之延期召集，除與上述國共間關於政協決議之爭執無法解決有關外；國共間關於東北爭執之不能解決，亦為另一項重要因素。早在抗戰勝利之初，中共即注意到對東北及華北的爭奪及控制，而俄共更積極協助共軍潛入東北，並阻撓國軍之接收；其後俄共因勒逼「東北經濟合作」不遂，乃又以種種藉口，拒不如期自東北撤兵。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均同意頒發的「停戰令」，雖明訂國軍為恢復主權而開入或在東北境內之調動，並不受影響，但事實上中共也絕沒有因此而放棄了他對東北與華北爭奪的意願。一月廿一日，中共中央就東北問題指示其重慶代表團，應向國民政府要求：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各種武裝力量與民選的地方政府；政府軍進入東北之總數，應予限制等主張。廿四日，馬歇爾曾要求三人小組能同意派遣執行小組至營口調解國共衝突，中共贊成；國民政府因顧慮妨礙其對東北主權之接收，未予同意。廿六日，政協尚未閉會，中共中央即指示其東北局，「必須鞏固的控制長春路兩側廣大地區，切實準備在蔣軍向我進攻時給以殲滅的打擊。」²⁵二月一日，本為蘇軍延期撤兵屆滿之日，而蘇軍不撤如故。九日，國民政府正為中蘇東北經濟合作問題，擬作最大讓步之擬議時，美國以違反門戶開放原則，分別照會中蘇兩國表示反對；國民政府因此而擱置了中蘇東北經濟合作問題之談判。²⁶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言人更將上月廿一日中共中央就解決東北問題給其重慶代表團的指示內容，具體的向外界作了說明。²⁷十五、十八兩日，張治中與周恩來尚在商

²² 《戰後中國（三）》，頁75-8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45。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211-302.

²³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329-331, 337., vol. X, pp.418-21. 國軍則於三月廿六日將其整軍清冊送交軍事小組。

²⁴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廿六冊，《戡亂軍事概況—整軍建軍》，頁2-3、121-2、150-3。

²⁵ 拙著，〈戰後初期的國共關係（1945年8-12月）〉，《國家發展研究》，第一卷第一期，頁221-4。

梁敬鎔，《中美關係論文集》，頁127-15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55-6、59-6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49, 69-71.

²⁶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册，台北：傳記文學社，1982，頁648-733。

《戰後中國（一）》，頁453-4。

²⁷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75-77。

談軍隊整編統編問題期間，周恩來即一再要求能商談東北問題，並主張「三人會議」應擴大將東北問題也包含在內，並應准許軍調部執行小組到東北進行調處。張氏未置可否。三月十一日馬歇爾擬返國述職前夕，應周恩來之要求，「三人會議」特為東北問題舉行第一次會談，結果未能獲得協議；²⁸ 馬歇爾旋即啟程返美。

三月廿一日，馬歇爾自美國電告吉倫 (Alvan C. Gillem) 中將，應儘速自國共雙方取得讓步，俾軍調部執行小組得以進入東北，調解爭執。廿七日，張治中、周恩來與吉倫就軍調部派遣執行小組進入東北一事達成協議。執行小組三方人員於四月二日抵達瀋陽，四月十四日蘇軍甫撤離長春，共軍即對長春展開圍攻，執行小組不能有所作為，同月十六日即南返。²⁹ 此時東北蘇軍表示將於四月底撤完，惟長

²⁸ 馬氏在會中之提案，其中第四條規定：「政府部隊有權佔領恢復中國東北主權必要之各地區，並特別指明政府軍隊，在沿中蘇條約中所載兩條鐵路之兩側三十公里，有單獨管轄之權。」（按：此條實為國民黨之主張），中共無法同意，致未獲協議。參見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 68。

《戰後中國（三）》，頁 78-9、86-91、296。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50-2.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510, 535, 542-553.

²⁹ 三月中旬馬歇爾離華期間，吉倫曾代表馬氏參加三人會議，就執行小組進入東北事進行討論。郭汝瑰（張治中隨員，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謂，馬歇爾離華後之三人會議談判中，周恩來對於「國軍得佔領鐵路兩側各三十公里之地區，及共軍不得佔領蘇軍退出之城鎮」兩點，本有同意之意；奈因蔣中正將條文作了修改，周反對，故直至三月廿七日雙方達成之協議中，始終未能將該兩要點列入。其後國軍北進困難，當與此項條文之未能納入，不無關係。馬歇爾對軍調部執行小組遲遲無法進入東北一事，認為係國民政府在策略上所犯的一項嚴重錯誤，致惡化了東北形勢；但他承認四月十八日共軍入據長春，則是違反停戰令的。梁敬錚則認為，馬氏對國民政府之批評有失公允，對中共則語存寬恕；梁對馬氏在國共有關東北問題未能取得協議之前，即匆匆返美，致令情勢惡化，尤感不解。參見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卷，頁 1706-16。

《戰後中國（三）》，頁 297-30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53-5, 95-100.

梁敬錚，《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頁 143-51、235-4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 79-84。

春以北地區，蘇軍不能等待國軍到達，只能將防務交與地方「現存武力」，說明了蘇聯因勒索〈中蘇東北經濟合作協定〉不遂，只得支持中共、阻撓國軍接收長春相報復。四月十四日，蘇軍北撤，共軍開始圍攻長春，而於十八日攻陷長春；馬歇爾則是日返抵重慶。³⁰

政協閉會之初，中共應尚有依政協決議參加政府、整編軍隊、停止對共軍直接領導，以與國民黨從事於群眾與議會「鬥爭」之打算，中共中央甚至決定了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為首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與行政院之名單，「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在宣傳上只批評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卻避免以蔣中正為目標，以爭取蔣向民主方面轉變。但因國民黨內「頑固派」（主要以陳立夫兄弟之 CC 派及黃埔系將領為代表）反對政協各項決議甚烈，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閉會後，因情況已有

³⁰ 四月三日蘇軍通知東北行營，其自東北各地撤軍日期，並表示四月底前可撤完（長春撤軍為四月十四或十五日）。惟至四月十八日共軍攻陷長春時為止，國民政府並未就東北經濟合作問題與蘇方達成協議。其後蘇軍北撤，國民政府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頗以此為蘇軍故意妨礙國軍接收長春之原因。Westad 認為，二月一日以後蘇軍仍不自東北撤兵，使美國對蘇聯越來越不信任，適二、三月間美蘇又有伊朗、巴爾幹之爭執，關係轉惡；雅爾達密約公佈及蘇軍在東北之大掠奪，使羅斯福總統晚年以來的東亞政策備受質疑，美國官員對蘇立場，乃漸趨強硬；史達林遂在並未與中國達成東北經濟合作協議的狀況下，片面自東北撤軍。關中認為，國軍接收東北之失利，不僅強化了國民黨內右派反蘇反共理由，也使彼等反對政協決議的立場更為合理化。參見

董彥平，《蘇俄據東北》，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5，頁 167-71、179-80、203-4。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册，頁 709-29。

關中，《國共談判（1937-1947）》，台北：民主文教基金會，1992，頁 286。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1-4.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 554, 566-583, 590-605.

變化，中共始改變策略，只力爭和平。³¹ 故四月份以後，國共雙方關係漸趨惡劣，應與「聯合政府」因非國民黨籍國民政府委員的席位分配問題，無法取得協議，致未能組成的因素關係甚大。

馬歇爾返美述職期間，國、共間在國民大會代表名額、憲草修改原則、擴大政府組織、停戰協定（令）、恢復交通、軍隊整編統編，乃至東北問題等方面，不論是否曾經達成協議，新的爭執，均不斷產生。（國共雙方應各負有其不遵守政協決議的責任）這種現象，不但影響到馬歇爾助華貸款之意願，對急欲在五月五日邀集各黨派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的國民政府來說，尤其增加了它的困難度。四月十五日，蔣中正召集政協各黨派代表舉行座談會，希望各黨派能於廿日前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及國民政府委員名單，但並未獲得各黨派正面回應。在國民政府非國民黨籍二十席委員的分配方面，國民黨同意無黨派代表所提：共產黨、青年黨、民主同盟、無黨派方面，各依八、四、四、四的名額分配，為中共所反對。中共堅持：一、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彼與民主同盟必須合佔十四席（即中共十席，民盟四席），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四十席中，取得三分之一以上之否決權。二、除非政府改組，否則中共將不參加國民大會。³² 由於此時國民政府尚無

³¹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62-6、72-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642-3、652。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263、284-8、307。

按照大陸學者的說法，整軍方案不僅是把中共部隊簡單的統編到國民黨軍隊中而已，也將對國民黨的地方系部隊的原來系統產生徹底的破壞，故中共不反對整軍。但中共反對將雙方軍隊進行混編；為保持對軍隊力量的控制，中共並決定要設法把大部份的武裝保存到其地方部隊中，以擺脫整軍的束縛。

見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頁209-214。

黃修榮，《國共關係七十年》，下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1522-6。

³² 參見〈駐美大使魏道明呈蔣中正報告〉，《戰後中國（三）》，頁111-2。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177。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六冊，《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中）》，頁171-4。

與中共決裂之決心，廿四日蔣中正約集政協各黨派代表商討，僉以時間倉促，制憲國民大會以延期召集為宜，以便繼續協商，得蔣氏同意；國民政府隨即明令公佈國民大會延期召集。³³ 中共以阻撓國民大會召開，堅決要求國民政府實踐政治協商會議全部決議的作法，使得國民政府面臨了極大的政治壓力。

參、1946年6月6日東北停戰令頒佈前後的國共爭執

當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國民政府決定延緩召開國民大會之時，亦正馬歇爾自美返華、共軍已攻占東北四平、長春、哈爾濱之會。自抗戰勝利前夕《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起，謀求順利接收東北，本即為國民政府最主要的政治目標，甚至不惜因此而對蘇聯作出犧牲中國權益的重大讓步（如旅、大共管，中東鐵路共營，允許外蒙古經由公民投票決定獨立等均是）；但蘇聯並不以此為滿足，又進一步勒索〈中蘇東北經濟合作協定〉。由於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止，國民政府並未就〈中蘇東北經濟合作協定〉與蘇聯達成協議，而蘇聯與美國在伊朗、巴爾幹等地則有日益升高的利益衝突，美國對蘇態度漸趨強硬，蘇聯不得已乃匆促自東北撤軍；卻暗中鼓勵支持中共攻佔長春、哈爾濱等地，以對國民政府進行報復。四月下旬，蘇軍北撤、長春失陷後，中共已明顯違反了本年一月十日國共均同意頒發的停戰令。且國民政府已於三月下旬交出了整軍相關資料，四月底並完成了第一期整軍工作；而中共則違反了整軍協定有關繳交相關資料表冊的時程規定，更遑論整軍。為謀求對東北軍事接收之勝利，迫使中共履行本年

³³ 《戰後中國（三）》，頁112-8。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107-20。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廿六日，第二版。

二月廿五日簽訂之軍隊整編統編方案，並使其對參加國民大會、改組國民政府等問題讓步，應為當時國民政府對東北採取強硬軍事路線的主要考量背景。此時中共對二月份軍隊整編統編方案十八個月終了時，國共東北駐軍應維持在十四個師與一個師之比例，向馬歇爾表達了不滿。依據同年一月十日頒發的停戰令規定，國民政府可因恢復中國主權而向（或在）東北境內調動軍隊；儘管蘇軍已於五月三日全部自東北撤出，馬歇爾亦極端反對國民政府以武力進佔東北各要地，而東北國軍仍於五月十一日展開軍事行動，十九日攻克四平，廿三日攻克長春，廿八日更東向收復吉林永吉，六月初且北向哈爾濱推進。蔣中正於國軍收復長春之日趕赴東北視察政軍情勢（六月三日始返回南京），廿四日向馬歇爾提出了中共應履行本年一月十日、二月廿一日及廿五日所簽訂的「停止軍事衝突」、「恢復交通辦法」及「整編統編軍隊方案」等協定，並應賦予軍調部美方代表有公斷及決定權之東北停戰條件；在此情形下，國民政府可考慮接受十八個月整軍方案終了時，國共東北駐軍維持在十五個師與三個師之比例。³⁴ 面對國軍在東北軍事上之勝利，中共中央此時之策略是，力爭東北停戰及制止全國內戰，如不能推遲半年，即使推遲一個月時間，亦將使其準備比較充份。³⁵ 周恩來則對蘇軍已經北撤，國軍是否尚可因恢復主權而在東北境內自由調動，感到質疑；希望軍調部能立即派員前往長春負責調處。蔣中正綜核前方報告，認為東北共軍經此次挫敗後，如無國際因素影響，將絕難再起；加以馬歇爾的一再施壓，並允軍調部工作人員可先進駐長春、但暫不執行職務前提下；蔣終於在六月六日發佈了自

³⁴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117-120.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823-33.

董彥平，《蘇俄據東北》，頁220-6。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二冊，《綏靖時期（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570-90。

《戰後中國（三）》，頁120-8。

³⁵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161-2、168-9。

翌（七）日正午起，東北國軍停止攻擊前進十五日之命令。在此十五日內希望能與中共商定上月廿四日他向中共所提出的停戰條件，並在恢復國內交通事項方面賦予美方代表以決定之權，馬歇爾並應就「整軍方案立即在東北首先實行」問題，自共方取得保證。³⁶

東北停戰令頒佈後，國共雙方除仍續有軍事衝突外³⁷，在馬歇爾調處下，國共雙方就國民政府在停戰令中所要求應達成協議之事項，進行了協商；直到廿二日停戰令期效屆滿時為止，雙方並未能就各項問題之商討達成協議。在馬歇爾要求下，蔣中正於六月廿一日再度宣佈，願將停戰期限再延長至六月卅日正午，俾便各項問題能獲得圓滿之解決。廿四日，國共雙方終於就一、恢復華北、華中之交通，二、結束東北之衝突，及三、美方代表之決定權問題，達成了協議。（但均未簽字）但關於實施二月廿五日軍隊整編統編基本方案方面，直到六月卅日停戰令效期截止時為止，國共雙方一直無法取得協議：關於十二個月終了時，整軍後數額問題，中共要求在東北較二月廿五日之協定多駐兩個師，並掌控哈爾濱、齊齊哈爾、洮南、牡丹江、安東等地，國民政府無法同意。關於共軍配置問題，其中爭執的焦點是：國民政府要求共軍必須從熱河的承德、江蘇省、東北的安東省，與膠濟

³⁶ 蔣中正對停戰令頒佈前後，東北國軍之情況，曾有以下描述：「我乃於五月廿一日親飛瀋陽，……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將絕無再起可能。……乃於六月六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當時……追擊部隊……若不停止追擊，直佔……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參見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頁171-3。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122-131.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891-2, 901-8, 976-984.

《戰後中國（三）》，頁127-8, 130-42, 174-7。

³⁷ 如東北方面，六月七日共軍攻占拉法，九日國軍則攻占法庫；山東方面，由於共軍進攻濟南，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調運二個軍進入山東，以維護濟南與青島的安全；共軍且在山西發動攻勢，圍攻大同。

鐵路沿線及其煤礦區全部撤出，並不得保有其原有的地方政府；中共則堅決表示，絕不從蘇北撤軍並要保有其在蘇北的地方政府。馬歇爾認為，國民政府的姿態過高、僵硬而缺乏彈性，是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的最主要原因。³⁸此一時期美國總統簽署了「海軍援華法案」〈六月十四日〉；同日，美眾院外交委員會另提「軍事援華案」，引起中共之不滿。廿二日，毛澤東發表〈反對美國軍事援蔣法案的聲明〉，除抱怨抗戰時期美國不對中共軍援外，並認為除非國民黨宣佈停止內戰，及宣佈履行政治協商會議關於國家民主化的決議，美國不應進行所謂的對華軍援。中共此時對政局的看法，顯然已較一個月前為樂觀，認為：上面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是國民黨區域兩大特點，京滬蘇杭等大城市人民情緒普遍反內戰，不滿意國民黨之情緒日益增長，我黨社會基礎從來沒有這樣廣大。³⁹應該是中共不願向國民政府多作讓步的一個重要原因。六月卅日下午，停戰令期效已經屆滿，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宣佈，國民政府仍願請馬歇爾繼續調解，期待和平解決；除非共黨進攻國軍，將不對共軍採取軍事行動。中共駐南京代表團發言人，亦表示願借重馬歇爾之調解，但對國軍除自衛外，將不

³⁸ 六月廿九日，蔣中正與馬歇爾就馬氏所提〈修正整軍方案意見備忘錄〉之商談，馬對蔣蘇北、承德、膠濟路之堅持，不以為然，雙方幾至攤牌；是日晚馬突又欲來謁，蔣遣夫人卻之，馬態度暴躁傲慢。參見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196-8。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136-176.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1113, 1169-88, 1191-1272.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七冊，《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下）》，頁412-449。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235-45。

《戰後中國（三）》，頁178-94、301-4。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卷，頁1718-23。

³⁹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般資料》，第309冊，No.350494，〈國府外交部次長呈蔣中正簽呈〉。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208-9、219-20。

對共軍採取軍事行動一節，表示譏諷與質疑。⁴⁰

七月二日，蔣中正約見周恩來，就雙方未能獲得解決問題，直接進行商談。周恩來強調：一、應早日全面停戰。二、擬請恢復政協綜合小組會議，協商改組政府事宜。蔣則強調軍事問題之解決，為商談政治問題之基礎；共軍須從蘇北、承德、安東，與膠濟鐵路等地撤出，其中尤其堅持中共必須儘速從蘇北、承德撤退，而承德以南地區，更須於一個月內完全撤出，否則一切無法再談，希望中共於一星期內答覆。八日，周恩來面告馬歇爾：「商談」者，實含有妥協之意，否則僅能獲得僵局；中共願於蘇北縮減軍隊，但絕非完全撤退，至於地方行政問題，將於正式停戰或改組政府為聯合政府後再予以解決，惟屆時應就中共所有區域作一整個商議，而非零星逐一商議。但政府立場異常堅硬，除完全拒絕中共建議外，又不提出反建議，實無異要中共接受其命令，故無法再談。擬將整個問題再交回三人會議解決。⁴¹國共之直接商談遂又告觸礁。

六月七日停戰令頒佈後，共軍因在東北遭遇挫敗乃暫採守勢，改在關內魯、晉等地發動攻勢，此舉自然違反本年一月十日頒發的停戰令。馬歇爾曾於該月廿六日，向周恩來明白指出，共軍在魯、晉之攻擊，為一甚具侵略性、威脅性之行動，故政府在山東之增兵自屬必然；卅日，馬氏亦曾向蔣中正明白表示，中共此舉為「暴行並極愚笨」。說明了由於中共率先在關內發動攻勢，馬歇爾不能制止國民政府自衛性的軍事行動，雙方的軍事磨擦自然升高。事實上國民政府自五月五日還都南京以後，深感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地區大部均在共軍掌控之下，對京畿威脅甚大，亦決計放緩東北軍事腳步，轉圖關內共

⁴⁰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213-8。

《戰後中國（三）》，頁195。

⁴¹ 同上，頁196-201。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344-9。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 177-85。

患之戡平。因此六月七日停戰令頒佈後，雙方潛在之軍事衝突，在關內反更形升高。學者認為七月以後：一、國軍五月克服四平、長春以後的信心，蘇軍的全面撤離東北，日增的美國物資援助之鼓勵；是國民政府愈來愈傾向於戰爭的重要原因。二、美國支持國民政府拒絕蘇聯東北經濟合作之要求，蘇軍撤離東北後美軍仍滯留中國不走，五月蔣中正拒絕史達林之邀訪；是蘇聯愈來愈傾向於支持中共對抗國民政府的原因。三、國民政府拒絕某些政協決議，蘇軍撤離東北後所出現的權力真空，美國持續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則是中共政策改變，愈來愈傾向於戰爭的原因。⁴²

七月三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訂於本年（一九四六）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並於翌日將開會日期明令公佈。七日，中共政協代表團聯名致函國民黨政協代表表示抗議，認為：「國大召集日期，原為政協決議事項之一。……本月三日，為國民黨一黨執政機關之國防委員會，竟片面決定召集國民大會日期……完全違反協商精神，敵方堅決反對。……關於國大諸問題，在未得協議以前，敵方不受貴方任何片面決定之拘束。」⁴³說明了國民政府已有不顧中共反對立場，儘早召開國民大會的打算與決心。

七月十一日及十五日，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聞一多（西南聯大教授）及其子，先後在昆明遇刺身亡；事後緝獲凶手竟係

⁴² <馬歇爾、周恩來談話記錄>，《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政治防共（國共協商）》，第十一冊。

《戰後中國（三）》，頁193。

《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9-28、307-14、327-44、371-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191、217、25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225。

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66-9.

⁴³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四日，第二版。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272-3。

雲南警備司令部之軍官。李、聞遇刺，使國內及美國各界對當時國民政府之形象，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⁴⁴

七月十四日，蔣中正移住牯嶺，直至九月下旬始返回南京。馬歇爾認為這意味著蔣不在南京期間，國共談判將大受阻礙。馬氏曾告知俞大維（蔣氏代表），國軍在各地的軍事行動，如繼有進展，他將被迫退出談判。周恩來則告知馬歇爾，如要解決地方政府問題，國民政府本身應先進行改組。可見中共此時仍未放棄改組國民政府問題的政治訴求。⁴⁵

七月中旬以後，國共在華北的軍事衝突轉劇⁴⁶；中共除續作反美宣傳外⁴⁷，並對駐華美軍展開挑釁：在冀東綁架並拘禁美軍人員數

⁴⁴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般資料》，第309冊，No.350462；第310冊，No.350573；第311冊，No.350706。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290-302。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182-3.

FRUS, 1946, Vol. IX, op.cit., pp.1380-1, 1426, 1451.

Yu-ming Shaw, op.cit., pp.171-2.

據一九八〇年中共刊物揭露之資料顯示，聞一多於案發當時，已具有共產黨員身份。參見〈聞一多是如何成為民主鬥士的？〉，《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五期，頁20-6。

⁴⁵ 自五月初國民大會延期召集以後，國民政府在「民主化」方面甚少著墨，王世杰曾有「用選舉方法，將國民參政會或立法院改造為國家最高民意機關，以免就此因循下去」之提議。參見

FRUS, 1946, vol.IX, op.cit., pp.1353, 1371-8.

梁漱溟，〈我所參加的國共會談〉，《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卷，頁1646-7。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322-3。

⁴⁶ 六月份東北停戰後，國共雙方之軍事衝突乃轉以華北為目標，如一、膠濟鐵路沿線，二、蘇北，三、津浦路地區，四、漢口以北地區，五、山西南部等地。參見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八冊，《軍調期間共匪擴大叛亂情形（上）》，頁1-11。

⁴⁷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七七九週年紀念宣言〉，除要求國民政府應立即發佈全國（包括東北）無條件無限期的停止衝突等命令外，並對美國展開抨擊；認為抗戰勝利後美國的一切作為，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國反動派的獨裁和內戰。馬歇爾認為中共在此宣言中攻擊美國，或與五月下旬國軍占據長春後並未停止攻擊，而蔣中正又適滯留北方，致馬氏連繫困難、難以有效達成停戰，而造成中共懷疑美國及馬氏之「公正」立場有關。參見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232-4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120-2.

日。月底，在平津之間的安平爆發攻擊美軍運輸車隊的安平事件，美軍計死亡三人，受傷十三人⁴⁸；暗示著中共對美國調解國共關係，沒有傾向中共的不滿。

肆、「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之擬議與挫敗

由於中國政軍情勢的日益惡化，馬歇爾希望能找一位德高望重並在中國有長久經驗的美國人來協助他進行調處工作，因此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遂受任為美國駐華大使。⁴⁹司徒氏於七月十九日向蔣中正呈遞到任國書，廿六日周恩來就國共衝突問題，曾向馬歇爾及司徒大使表示，國民政府應立刻頒發無條件的停戰令，並且將六月份休戰期間國共曾達成協議的部份付諸實施（按：如恢復交通、結束東北衝突等項），然後再依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對改組政府的問題進行討論，然後再討論地方政府問題。關於國民政府的改組與地方政府問題，他建議國、共雙方可派出代表與司徒大使作初步討論，如有結果，再依政協決議送政協綜合小組批准；至於停止衝突問題，則應由馬歇爾原主持的三人會議來加以處理。除此之外，則國共雙方只有走上全面內戰的一途。周氏此種政治與軍事問題同時解決的建議，顯然獲得了馬歇爾的認同，於是八月份以後他除了繼續推動國共雙方就停止軍事衝突一事達成協議外（按：國民政府此時並無意頒發無條件停戰令），如何就促成改組國民政府問題，使雙方能達成協議，俾作為進一步獲取達成停戰協議的重要基礎，遂變成馬氏與司徒雷登認為值得積極進行的另一個重要項目。於是以司徒雷登為主席，成員包括國共雙方代表各二人，以討論改組國民政府為議

題的一個特別小組（按：即以後所謂的「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在馬、司徒的勸說下，八月五日原則上算是得到了蔣中正的同意。

蔣中正雖在原則上同意組成此「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但六日他隨即向司徒大使提出了組成該小組的先決條件：一、蘇北共軍應撤至隴海鐵路以北，二、共軍應自膠濟鐵路撤退，三、共軍應自熱河承德及承德以南地區撤出，四、東北共軍應退入新黑龍江、嫩江和興安省，五、山西和山東共軍，應撤離自六月七日以後在該兩省所占領之地區。以上各項規定，應在一個月至六個星期內實行。（未提及地方政權問題）蔣氏的這些先決條件，幾乎與他一個多月前的主張完全一樣，甚至更為嚴苛。周恩來認為蔣氏以上各條件，關於共軍撤出後的地方政府問題，均未提及，以及目前所提出的條款，實比以往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更為苛刻，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八日，馬歇爾告訴蔣氏，他的工作目標是促成一個統一的新生的中國，而不是如國民黨所想像的，使共產黨就範，最近李聞等案的發生，代表著中國對自由主義見解的壓制，它已使全世界（含美國）震驚和憤怒。此時中共一方面拒絕蔣所提的五項條件，談判陷入僵局；一方面又阻礙美軍安平事件之調查，並將延誤調查之責歸咎於軍調部中的美國與國民政府代表。馬歇爾對此雖甚不滿，卻不便發表澄清或指責中共的聲明，以免為國民黨中的「頑固份子」所利用，而使談判更難獲得進展。⁵⁰

八月十日，馬歇爾、司徒雷登在相繼與周恩來、俞大維溝通，無法在軍事、政治上取得協議以後，遂發表了「聯合宣言」，說明目前國共雙方不能獲得妥協問題癥結之所在（共軍撤出地區地方政權之歸屬問題尤難解決）；希望透過輿論的力量向雙方施壓，以解決他們的歧見。除了發表「聯合宣言」以外，美國杜魯門總統並以向蔣中正致私人密函的方式，向蔣氏施壓。（按：致送蔣密函的方式與內容，實

⁴⁸ 《戰後中國（三）》，頁201-6。

⁴⁹ 司徒雷登結識馬歇爾及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經過，見 Yu-ming Shaw, op.cit., pp.152-7.

⁵⁰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182-198.

FRUS, 1946, Vol. IX, op.cit., pp.1408-10, 1416, 1427-34, 1452-71.

際上為馬、司所建議與草擬。)該信函談到了美國人民對中國日益惡化的政、軍情勢的關切，並談到國共兩黨的極端份子對阻撓解決局勢所應負的責任。除非短期內在和平解決中國內部問題上確有進展，不能期望美國輿論對中國仍保有慷慨大方的態度。十一日，周恩來就馬、司「聯合宣言」向司徒雷登表達了中共的立場，只要滿足了下列條款，中共可以接受蔣中正六日所提的五個條件：一、蘇北地區，按照二月二十五日的統編方案，中共現正考慮由配置三個師減為一個師，但中共絕不同意放棄蘇北。二、膠濟鐵路，中共將完全撤出。三、如允許在承德保有軍隊，則中共願將熱河南部軍隊撤走。四、東北，安東省是惟一涉及的主要問題，也許易於解決。五、山東、山西方面，只要國民政府願意採取同樣的行動，中共願將其軍隊撤出六月七日以來所佔領的城鎮。十四日，蔣中正發表〈抗戰勝利一週年紀念文告〉，除重申決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外，對於停戰問題，並無明白承諾。中共對馬、司「聯合宣言」的反應，顯然要比國民政府柔軟的多。

十六日，蔣中正約晤馬歇爾，主要討論杜魯門信函所涉及的問題，蔣除對中共多所指責外，對停戰與談判問題，仍無明確讓步之表示。馬則表示，此時的敵對行動對國民政府損失多而得益少，且可能使國家經濟崩潰、政府垮台；聯合政府如無中共參加，只有更增加其反抗決心而已。馬氏敦促蔣氏能接受司徒大使的建議，派出非正式五人小組的國民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協商改組國民政府的問題。馬氏綜合他與蔣會談所得印象及蔣「八一四文告」觀察，認為蔣顯然傾向於把武力政策作為惟一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⁵¹或許由於馬氏對蔣反

⁵¹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Ibid., pp.201-8.

FRUS, 1946, Vol. IX, Ibid., pp.1473-89, 1493-1507; Vol. X, pp.1-2, 51-3, 756-7. 《戰後中國(三)》，頁207-212。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217、25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馬歇爾使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21。

應之不能滿意，未幾，美國政府遂對國民政府停售軍火⁵²，進行了實際上的施壓與報復。

八月中、下旬，馬歇爾、司徒雷登雖仍為促成國共雙方之妥協而積極奔走，國、共在原則上雖都不反召開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以協商歧見，蔣中正且於該月底(廿九日)提出了參加該五人小組會議的二位國民政府代表名單(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與內政部長張厲生。中共則已提出其代表名單為周恩來、董必武。)，但對他該月初六日所提出的五項條件，仍不願意讓步。中共的周恩來則堅持，在國民政府委員會的改組中，中共須擁有足夠的否決權席位，並對停戰之獲得，表示悲觀。加以該月卅一日美國來華談判轉售剩餘物資之代表與國民政府簽署了轉售民用物資合約，更使中共反美情高高漲。因此不僅八月份馬、司有關召開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的斡旋，並無成效；國共雙方在軍事方面之衝突，反有持續惡化現象：國軍攻占膠濟鐵路全線，承德及蘇北若干城鎮；共軍則持續圍攻山西大同，並在隴海鐵路的徐州至鄭州段發動攻勢。而大部份政府預算用於軍事的國民政府經濟形勢，也令馬歇爾感到憂慮。⁵³

九月上旬，顯然因為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有所斬獲，蔣中正同意馬、司原所主張的，先開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以討論改組國民政

⁵² 邵玉銘認為，馬歇爾停售國民政府軍火並讓周恩來知悉，實係一錯誤的作法，如此將使中共更不須與國民政府尋求妥協之道。參見

Yu-ming Shaw, op.cit., pp.175-6, 194-5.

梁敬錚，《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頁543-7。

⁵³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 214-228.

FRUS, 1946, Vol. X, op.cit., pp. 72-5, 90-2, 96-107.

Suzanne Pepper, "The KMT-CCP conflict 1945-1949"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ol. 13, pp.735-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二月)》，台北：國史館，1990，頁447-8。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般資料》，第312冊，No.350773，〈蔣中正致行政院長宋子文電〉。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314-31、345-62。

府問題，俟取得協議後；再開三人小組會議討論停戰問題。軍事上的居於劣勢，周恩來則堅持國民政府應先發佈停止衝突命令，始願參加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十六日，周恩來且自南京移住上海，臨行前向馬歇爾致送了備忘錄，除抗議美國政府向國民政府出售剩餘物資外，並表示如一旦決定召開三人小組會議，他將立即由滬返寧，顯然意在向馬、司及國民政府就停戰問題施壓。此期間國軍正加緊對張家口進行攻擊佈署；馬歇爾曾向蔣中正建議，可否同時召開三人小組與五人小組會議，遭蔣拒絕。蔣並向馬歇爾明言，他不締結停止衝突協定，正是迫使中共指派其國民大會代表的重要手段。馬歇爾亦曾向中共代表指出，中共四月份攻佔長春、六月份攻打山東，以及至今拒不提交整軍之相關表冊，是談判至今陷入僵局中共應負的責任。九月十九日大同解圍；廿六日，蔣中正返回南京；廿九日，國軍進攻張家口。周恩來為此向馬歇爾致送了備忘錄，抗議大同已經解圍，而國軍卻仍然在進攻張家口。⁵⁴

⁵⁴ 六月底，傅作義從軍略觀點建議蔣中正應考慮攻佔張家口。七月中旬蔣電傅，須先攻下承德後，始能進軍張家口，攻期定於八月底、九月初，請傅積極準備。而中共七月下旬開始圍攻大同，至八月份形勢益為緊急，廿七日，軍調部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通知中共，如不停止進攻大同，國軍即將進剿張垣、延安；廿九日東北國軍收復承德，九月中旬傅作義收復集寧，大同旋解圍。此時蔣中正已有先攻下張家口，再下令停戰，逼中共參加國民大會之策略。參見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八冊，《軍調期間共匪擴大叛亂情形（上）》，頁126、148、162、215、301。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上），頁231、242、253-5。

天津大公報，民國卅五年九月卅日，第二版。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230-43, 256-9, 263-296.

FRUS, 1946, Vol. X, op.cit., pp.116-29, 132-46, 171-82, 189-5, 207-8, 224-37, 243-59.

伍、張家口停戰問題與國民大會之召集

十月一日，馬歇爾向蔣中正致送要求張家口停戰的備忘錄。蔣在翌日答覆馬歇爾的備忘錄中，表明國民政府對解決時局可能讓步之最大限度：一、關於國民政府之改組案，政府同意中共可有國府委員八名，民盟四名，另無黨籍名額中，一名由中共推薦，共十三名；中共即應提出其國民政府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之名單。二、為切實實行整軍方案，應迅速規定中共十八個師之駐地，並按規定期限，進入駐地，此項決議，應由三人小組協定後，交軍調部監督施行。中共如願迅速解決此二問題，則雙方於獲得協議時，可立即宣佈停戰。中共代表對國民大會開會的合法性，及六月份有關中共部隊駐地之協議，不知是否繼續有效表示質疑。馬歇爾在與司徒雷登討論了蔣的備忘錄後，認為蔣不無利用美國調處以謀取國民政府利益之嫌，並無停止對張家口進攻之意。在馬以去就力爭下，六日蔣終於接受馬氏休戰十日的主張。同日，馬以備忘錄通知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同意：休戰十日由美方宣佈，中共應履行十月二日蔣致馬備忘錄中的兩項條件。八日，中共代表向司徒大使轉達了延安的口頭答覆：一、休戰應無時間之限制，二、三人與五人小組之召開，討論內容不應只限於十月二日蔣致馬備忘錄中所列的兩個條件。等於拒絕了馬、司休戰十日的建議。馬、司二人對中共前此一再要求停戰，現在卻又拒絕其休戰建議，深感迷惑不解，不得已遂於同日又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說明九月卅日至十月八日之間，國共雙方談判的來龍去脈。九日，馬歇爾秘密飛往上海會晤周恩來，希望能從與周的會晤中，尋求突破談判僵局的契機。周恩來認為十月二日蔣致馬氏備忘錄中所說的兩個讓步，在中共看來是難以接受的條件。國民政府如有誠意應在全國範圍內（不限於張家口）實施無限期的休戰，雙方軍隊在關內與關外，應分別恢復到一月十三日及六月七日的位置。在國府委員會中，中共與民盟仍應合佔十四席；行政院應與國民政府同時改組，政協憲草審議

委員會應即復會，就提交國民大會的憲法草案定稿，各黨派均應保證擁護此憲法；政協綜合小組應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及各黨派席位的最後分配；地方政府問題，暫維現狀，以待國民政府改組後實施地方自治。周並認為馬係在助蔣壓服中共，休戰十日亦係為蔣作緩兵之計。馬氏對於中共認為，蔣的休戰是為了贏得時間，以便調整軍隊與軍火等的邪惡目的一事，表示遺憾；因為事實上，蔣是因為馬的一再斡旋與施壓，才願意休戰的。雙方會談氣氛，並不融洽。⁵⁵

十月十日，國軍收復赤峰，同日，國民政府公佈了修正的「兵役法」，恢復全國範圍的徵兵；十一日，國軍攻占張家口。十二日，國民政府明令國民大會將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政府以上舉措，使受司徒雷登慫恿前往上海，勸請周恩來返回南京的第三方面代表（包括民主同盟、青年黨與無黨派代表），功敗垂成。十六日，蔣中正發表了經他與馬、司磋商多次的對時局正式聲明，要求中共如同意非正式五人小組會議與三人小組會議同時召開，以達成恢復交通、整編軍隊、改組政府、中共出席國民大會等問題之協議，在此情形下，政府可下令停止軍事衝突。（按：即所謂的八項辦法。）結果為中共所拒絕。儘管中共對蔣十六日聲明的反應不佳，由於第三方面之遊說，周恩來終於廿一日晨返抵南京。蔣中正因馬歇爾之勸說特延後行程，與周及第三方面代表禮貌性會晤後，始前往台灣。十月初旬以來，國軍在華北方面的軍事仍居於優勢，計：八日攻占察哈爾之張北，魯南之

⁵⁵ 馬歇爾對於中共一直要求停戰，而又拒絕其休戰十日的提議，感到大惑不解。原因應是：中共認為國軍進攻已達到了頂點，過此以後便無力再進，彼等便可轉入反攻。且三個月來，共軍已殲滅了國軍正規軍廿五個旅，今後數月應為再殲滅其正規軍廿五個旅而奮鬥。十月九日馬歇爾與周恩來之會談，梁漱溟謂雙方曾有爭吵，馬遂暫時不便介入國共之調處工作。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307-8。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卷，頁1654。其餘參見FRUS, 1946, Vol. X, op.cit., pp. 267-76, 282-301, 310-3。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378-400、412-27、433-4。
《戰後中國（三）》，頁218-25。

棗莊，蘇北之高郵；十二日攻占豫北之焦作，察境之多倫宣化；十三日攻占察境之懷來；十八日收復魯西之鉅野嘉祥；廿五日收復東北之安東等地。中共除繼續在各地進行反美宣傳外，並將其駐寧、滬、渝人員陸續撤回延安。⁵⁶

十月廿一日周恩來返抵南京後，第三方面仍積極介入國共談判之斡旋，但無成效。⁵⁷ 廿八日，蔣中正自台灣返回南京。由於國民大會開會在即，營造和平氣氛自有必要；十一月八日晚，蔣終於發佈了他與馬、司折衝多次的停戰聲明⁵⁸：

今當國民大會開會之前夕，…已明令關內外國軍除為防守現地所必須者外，停止其他軍事行動。…政府已決定國民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如期開會。…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黨派在國民大會應選出之代表名額，仍望其隨時參加制憲，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參加各種會議，根據於十月十六日聲明所提各點，商談停止衝突辦法與今後軍隊駐地分配以恢復交通與整編統編等辦法，以期從速實行。

關於國府委員會之改組，望能早日獲得協議，俾能正式改組成立。…行政院…其改組…國民大會閉會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變更。

⁵⁶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299-307, 312-24.
FRUS, 1946, Vol. X, op.cit., pp.332-41, 363-6, 373-5, 380, 384-6, 394-9.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437-51, 457-9。

《戰後中國（三）》，頁226-31。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頁689-695。

⁵⁷ 民盟秘書長梁漱溟在此期間曾擬一折衷方案，分送國、共、馬歇爾三方面，結果為中共所反對，梁氏乃又匆匆自三方面取回該方案，旋辭民盟秘書長職務。參見

《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下卷，頁1657-65、1672-82。

《戰後中國（三）》，頁232-40。

FRUS, 1946, Vol. X, op.cit., pp.412-21, 445-8.

⁵⁸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p.351-7.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九日，第一版。

十日，中共中央對蔣八日聲明作出回應，認為蔣所召開的國民大會，是違背政協決議與全國民意的，其所宣佈的停戰令，實際是繼續大打的作戰令；蔣氏如欲證明他對和平具有誠意，應當：一、下令停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大，二、撤出侵入解放區的軍隊。⁵⁹

馬歇爾對於蔣中正以宣佈停戰令的方式來召開國民大會的看法是：「休戰的辦法…事實上它仍然含有以重開戰事來強制推行一個政治決議的明顯威脅。更為重要的是，國民政府對於國民大會的籌措並未充分遵照政協協議。」⁶⁰ 應屬持平之論。

由於直到國民大會開會前夕，第三方面並未能提出他們的國大代表名單，十一日夜，蔣中正在與第三方面代表的會晤中，決定將會期延遲三日舉行，以等待他們提出國民大會代表的名單。十三日，周恩來與馬歇爾有過一次長談，周希望國民政府能推遲國大開會時間，俾有時間優先解決停止衝突的問題，但無結論。十五日，國民大會正式開會，當晚無黨派人士和青年黨補交了他們的代表名單。民社黨在其主席張君勱廿日致函蔣中正，要求徹底執行停戰令並保證政協修憲原則能在該次國民大會中獲得通過，且得到蔣中正回信允諾後，始在廿三日提出了他們的國代名單。〈張君勱本人並未同意出席，故未列在該名單內。〉中共與民主同盟則始終拒絕提出其代表名單〈論者謂中共拒絕參加國民大會，蘇聯的壓力亦為一個因素〉。⁶¹

國民大會的終於如期開會，以及大部份第三方面人士的與會，使中共在此問題的立場上，頗有進退失據之感。十六日，周恩來就國民大會問題發表了聲明，認為「一黨國大」開議後，已經把政協決議破

壞無遺，和談之門已被最後關閉；中共不承認這樣的一個國民大會。十九日，周恩來飛返延安，象徵著一年來國共談判的走向決裂。而國民黨主導的國民大會，也終於在同年的十二月廿五日，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國民大會開會期間，不少國民黨籍國大代表又圖毀棄政協修憲原則，恢復「五五憲草」的條款，經民社黨籍國大代表不惜以退席表示抗議，並經蔣中正出面斡旋後，始又恢復了原政協修憲原則的面貌。）⁶²；馬歇爾則於翌年一月初結束了其在華的調處工作，返回美國就任國務卿。

陸、結語

檢視國民大會一九四六年五月延會到十一月開會期間的國共爭執，其特點為：國共均有「軍事上優勢之取得，為其政治談判勝利之憑藉」觀念⁶³，由於國民政府在軍事上較具優勢，以致在談判的姿態上甚為強硬，幾近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中共接受其所提條件，且條件甚為嚴苛，鮮少有太多討價還價餘地。（如六月底至八月底雙方關於承德、江蘇、安東，與膠濟鐵路沿線等地區的爭奪；七月底至十月中旬間，有關討論停戰的「三人會議」與討論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的「非正式五人會議」，究竟何者應先召開的爭議均是。中共實際上是居於較被動地位。）能獲得協議的機會自然減少。中共由於在軍事上尚不具有絕對優勢，以致在應付國民政府談判的姿態方面，較為柔軟而有

⁵⁹ 《國共談判文獻資料選輯》，頁 475-6、483-4。

⁶⁰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I, op.cit., p.359.

⁶¹ *Ibid.*, pp.367-73.

FRUS, 1946, Vol. X, op.cit., pp.523-34.

南京中央日報，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二—十六日。

李炳南，《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談判》，頁 413-23。

⁶² 《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242-4。

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後，一般均認為是符合「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參見

李炳南，《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談判》，頁 424-35。

〈馬歇爾離華聲明書〉，《戰後中國（三）》，頁 266。

李宜培、潘煥昆譯，《司徒雷登回憶錄》，頁 105。

⁶³ 參見〈馬歇爾、周恩來談話記錄（1946.6.26）〉，《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政治防共（國共協商）》，第十一冊。

彈性，如：要求停戰、要求落實執行政協各項決議等主張即是，有時亦有若干讓步意思之表示；以爭取各方好感。但這並不表示中共對關乎其基本政治利益的各項議題，將輕言犧牲（如對蘇北、安東、承德以南等地，雖表示願減少駐軍，卻絕不願交出各地方政權；馬歇爾對此知之甚稔。），對其軍事攻勢與軍事準備，也是絕不放鬆的。由於雙方基本政治立場差異極大，以致談判幾乎不可能達成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妥協方案，結果只有更助長了軍事上的衝突。這就是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國共關係的真實寫照。馬歇爾調處國共關係，最後雖國共雙方對之均不滿意；但他認為國民政府「希圖以軍事優勢壓逼中共就範、或試圖以武力統一的作法，基本上甚難實現，且可能拖垮國民政府的經濟，因此宜儘量尋求與中共達成妥協之道」的看法，事後觀察，似乎也不能說馬氏全無先見之明。

回溯一九四六年初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後的美、俄、國、共四角關係及其後國民大會的制憲，就國民政府的牌應之道而言，似有下列數事值得關注：

一、「停止國共軍事衝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籌組聯合政府」，是美國對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在軍事上對國民政府尚未形成絕對優勢以前，透過『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及『聯合政府』之籌組，以提升其政、軍地位，並進而在中央政府形成影響力」，則為中共抗戰末期以來對國民黨最主要的「鬥爭」策略。美國與中共的策略，至此遂有合流之勢。馬歇爾抵華後，國民政府為化解美國的政治壓力，以免影響國、美關係，乃不得不對中共採取妥協態度，這就是其宣佈停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進而在聯合政府等議題上與在野黨派達成若干協議的重要背景。但國民黨內的當權派（或即中共與馬歇爾所謂的「頑固份子」）頗多不以政協決議為然者。⁶⁴這就是政協閉會後，中共期望國民政府實現政協全部決議，

而國民黨當局卻務求對各項決議加以修改的重要原因。中共雖對國民黨的此項作為深表反對，但客觀的說，國民黨當局在政協會中及會後修改政協決議的「鬥爭」方面，應非全然居於劣勢（當然不可能是為所欲為的），如：1. 抗戰前已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之效期方面，已在政協會中獲得了各界之承認。2. 政協決議的〈憲草修改原則〉，政協會後國民黨也已循合法途徑、並經中共代表同意而作了若干修正。（雖非百分之百的滿意）3. 在「改組國民政府」方面，依政協決議：國民黨在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中，擁有半數的席位，尚屬差強人意。中共與民盟席位的分配，中共在政協會後堅持必須擁有十四席，俾便擁有否決權，固不能為國民黨所接受；但國民黨自己在政協會中並未能將之訂明，同意「會後另行商定」，又何能獨怪中共為無理。即便如此，國民黨本身是否必不能容忍中共與民盟在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中擁有十四席，似亦值得商榷？（此項爭議一直是一九四六年國共雙方無法突破的重要心結之一）蓋即使中共與民盟合佔十四席之國府委員，依政協決議彼等在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中亦只能對性質涉及施政綱領變更之議案，擁有否決權；至於一般議案，乃至其性質是否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議案，則仍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通過為準。而關於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之任免，暨立法、監察委員之任用，乃至財政計畫及預算等事項，自應屬於一般議案無疑，則國民黨欲在國府委員會中尋求過半數之支持應非難事，如此何必定須對中共之主張採深拒固閉態度？倘聯合政府能儘早組成，則國民政府所欲尋求的美國支援應可加強，而中共其後拒不整軍及拒不參加國民大會之態度，亦將失其重要藉口；七月以後中共所欲保留的地方政權問題，亦將不乏仲裁機關。在此背景下，雙方之軍事衝突或可減少，國民政府正可尋求美國加強其經、社建設之援助，以挽救其戰後日益凋敝之經濟，如此則國府之政治地位將因而提升而非衰落。但國民黨當局不此之圖，姿態甚高，致令雙方的政治僵局難解，軍事衝突轉劇，美

⁶⁴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263、284-8、307。

國停戰、停援的壓力日增，情勢對國民政府自非有利；結果只有更乞靈於對中共的全面軍事壓迫。但中共此時之實力已非抗戰前夕的吳下阿蒙，其除在關內各地儘量另闢對其有利的第二戰場外，俄共尚在東北接濟其日軍所遺武器⁶⁵；致國軍師老而未必能竟全功。故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始終不願接納中共與民盟合佔十四席國府委員之主張，最後只想以武力迫使其接受十三席之擬議，是否即為得計？遂不能不令人無疑。

二、戰後前期蘇聯一方面暗助中共進入東北，以要脅國民政府親蘇疏美、並對「東北經濟合作」問題讓步，一方面又抑制中共不可對國民政府採過激對抗手段、以免過於破壞國、蘇關係，手段誠屬毒辣。但國際政治是殘酷而講現實的，政協會後數月間，國民政府當局激於義憤，堅持除非蘇軍全部自東北撤走，將不與之議定〈東北經濟合作協定〉⁶⁶，決策誠屬悲壯痛苦；但就現實政治利害言，是否真有其價值與意義，似亦頗堪商榷？約而言之，倘國民政府真能「打落門牙和血吞」，不顧輿論之攻擊與士大夫之清議，亦不顧美國可能之抗議，儘早與俄議妥〈東北經濟合作協定〉，則蘇聯在東北是否一定必

採捨國就共之策略？東北局勢倘因蘇聯之作梗無法順利接收，則使國共在東北呈勢均力敵之勢，或使東北「中立化」⁶⁷，似或猶愈於使蘇聯別無選擇的全力支持中共？故政協會後之三個月內，國民政府當局未能儘早與蘇聯就「東北經濟合作」問題，尋求出妥協之道，是否即為得計？遂成另一疑問。

三、一九四六年的國共競逐，就雙方來說，可說是得失互見：國民政府不惜用強力的手法，在中共極力抵制杯葛的情形下，來完成其憲法的制定，固有結束「訓政」、洗刷其長久以來被國內外各界批評為「不民主」惡名的期盼；但未能完全依照政協協議的程序來完成制憲，也成了中共與馬歇爾批評的話柄。同時由於時間短促及為形勢所迫，《中華民國憲法》之制定，乃不免有中央政府體制設計欠完善、且受少數民社黨人挾持之譏。⁶⁸更由於堅持武力進擊政策，不願在

⁶⁵ 參見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的任務〉，《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重慶出版社，1992，下卷，頁462。

梁敬錚，《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頁237、294、547。

⁶⁶ 外交部長王世杰應為代表人物，惟即便如此，不少士大夫均攻擊王世杰，認為其對蘇態度過於軟弱；而王世杰則又認為國民政府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對蘇軍態度過於軟弱。（張氏傾向於早日與蘇軍議定東北經濟合作協定，但即便如此，是否即能順利接收全東北，張氏看法仍有保留，認為或僅能順利接收南滿。）參見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264、269-70、281、292、297、301-3、309。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册，頁629-30、633-4、650、657、669、701。

邵玉銘，《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台北：傳記文學社，1980，頁29、46-9、92-4。

⁶⁷ 一九四五年末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 將軍曾有將東北委由聯合國「託治 (guardianship or trusteeship)」之建議，美外交當局無反應，蔣中正亦未同意。參見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Y: Henry Holt Co., 1958), pp.348-9.

《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三冊，《國共協商與共軍叛亂》，頁374-7；第十五冊，《戡亂軍事概況—東北方面》，頁158-161。

⁶⁸ 憲法學者謝瀛洲曾謂，一九四六年制定之《中華民國憲法》，只能視為協定憲法（各黨協定），其理由有二：一、提出國民大會之憲法草案，係依政協修憲原則而制定，且開會之先，蔣中正已與民社黨主席簽立合約，保證議定之原則不變，故國大實少自由討論之餘地。二、國民大會之構成份子，除人民代表外，尚有各黨派遴選之代表，此輩遴選之代表，反具操縱全體民選代表之力量，故在會場中常有多數服從少數之情形。「不但多數屈服於少數，實為全體屈服於一人。尤可異者，此壓迫全體代表之人，其本身並非國民大會代表，此實開制憲史空前未有之成例也。」參見

謝瀛洲，《中華民國憲法論》，台北，1967，頁14-5，及自序頁2。

政、軍上對中共作過多的讓步與妥協，反而成了她其後一、二年軍事、經濟陸續出現潰敗現象的先兆。⁶⁹ 中共雖在召開國民大會、改組國民政府、修改憲法草案等問題上，未能以挾持刁難國民政府的作法，來達到她掌控國家主導權的目的；但在談判過程中，不斷要求與迫使國民政府停戰，因而為她爭取到了走上全面決裂之路較多的準備時間，並達成了她「教育」民衆，「誘破壞政協決議責任於國民黨」的政治目的。⁷⁰

⁶⁹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翌年五月，國軍整編第69師、26師、74師等，先後在蘇北、山東為共軍殲滅。王世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其日記中對國民政府財經情況之惡化，頗多感慨言論，並謂物價指數已為戰前之一萬倍；陳立夫則指責宋子文應為戰後國民政府財經情況之惡化，負主要責任；及一九四七年五月興起之「反饑餓、反內戰」學潮，均可視為明證。一九四五年末及翌年初，張治中、陶希聖曾先後建議，對中共問題宜採政治、不宜採軍事方式解決，但並未成為主流意見。馬歇爾在華期間，亦屢次向蔣中正進言，持續之軍事行動將導致國民政府經濟崩潰、政府垮台，但蔣並不以為然。參見《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九冊，《軍調期間共匪擴大叛亂情形（下）》，頁469-474、540-4；第廿一冊，《戡亂軍事概況—華中方面》，頁122-6。

《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政治防共（國共協商）》，第十五冊。

《王世杰日記》，第五冊，頁341、347、426。

陳立夫，《成敗之鑑》，台北：正中，1994，頁335-43。

Yu-ming Shaw, op.cit., p.184.

⁷⁰ 〈一年來的談判及前途〉，《周恩來選集》，上卷，頁251-60。

The KMT-CCP's Contentions During the Adjourning to the Convening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China in 1946

Kuo-cheng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CC) in January 1946,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China must be convened on May 5 of the same year. After January 1946, the contentions regarding the practice of the PCC's resolu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Manchuria crisi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ere so serious that KMT declared to adjourn the convening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April 24, 1946.

Wining the superior in the battlefield in order to force another side to yield to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was the same strategy used by KMT and CCP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1946. In May 1946, KMT reclaimed Changchun that had been occupied by CCP in April and hoped to occupy more places in Manchuria.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China was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s primary mission to China in 1946. Compelled by General Marshall, Chiang Kai-shek announced a truce in Manchuria on June 6, 1946 and resumed negotiation with CCP agai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KMT and CCP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in China after the truce in Manchuria had never produced a compromise. Their military conflicts in Northern China

became more fiercely and eventually KMT captured Kalgan on October 11, 1946. However, this didn't make CCP yield to KMT's conditions.

In July 1946, KMT promulgated th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would be convened on November 12. It was convened on November 15, in spite of CCP's rejection,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rupture of the KMT-CCP's relationship in 1946 and general Marshall's return to US in January 1947.

Key wor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CC), National Assembly, the principles approved by PCC for revising the 1936 Draft Constitution, a basic formula for the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into the National Arm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ang Kai-shek, Mao Tse-tung, Chou En-lai, George C. Marshall.

BEIJING'S TAIWAN POLICY: Tactical Adjustment and Strategic Persistence*

Chong-Pin Lin

Part-Tim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收稿日期：91 年 12 月 20 日 接受日期：92 年 1 月 6 日